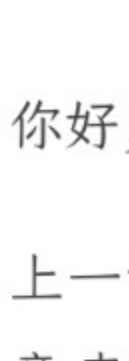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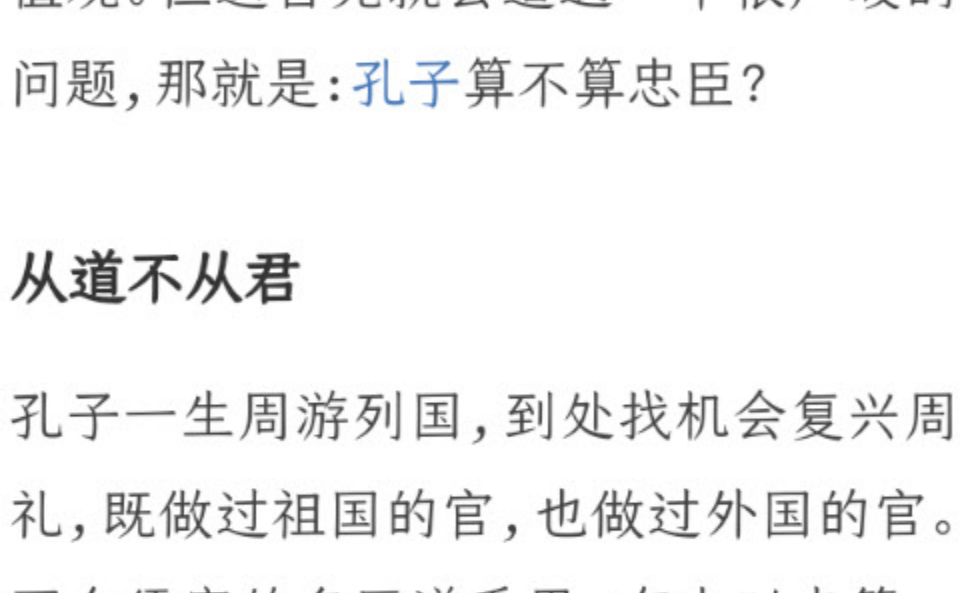
126 孔子算不算忠臣？

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（年度日更）

进入课程>

12-01



转述：金北平

你好，欢迎来到《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》。

上一讲谈到，在王蠋事件上，司马光特意表彰忠臣榜样，借王蠋之口来宣扬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”的价值观。但这首先就会遭遇一个很严峻的问题，那就是：孔子算不算忠臣？

从道不从君

孔子一生周游列国，到处找机会复兴周礼，既做过祖国的官，也做过外国的官。而在儒家的名臣谱系里，有史以来第一位模范宰相伊尹有过所谓“五就汤，五就桀”的经历。也就是在商汤王和夏桀王之间来来去去地做官，最后才终于认定商汤王了，辅佐商汤王改朝换代，建立了殷商王朝。假如王蠋的价值观才是人间正道的话，那么伊尹也好，孔子也好，岂不是要被拉下神坛再踏上一万只脚？

在儒家传统里，理解伊尹和孔子本来不难，标杆就是一句话：“从道不从君”。也就是说，道，或者真理，才是儒家应该矢志不渝的唯一目标——真理在刀山，那就上刀山；真理在火海，那就下火海。如果国君的指令和真理的所在刚好重合，那就最好。而如果并不重合，甚至南辕北辙的话，一名合格的儒家知识分子必须坚持真理忤逆国君，而不能逢迎国君背弃真理。

这个道理的背后隐含着是一个很朴素的认知模式，那就是觉得世界很简单，误解很容易消除。如果张三和李四意见有分歧，张三苦口婆心地解释再三，李四却丝毫不为所动，那只能说明李四动机不纯。今天论坛上的各种漫骂，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来的。观点不同的人自然会彼此质疑对方的动机，进而质疑对方的人品。但世界毕竟没那么简单，儒家和墨家曾经势同水火，今天来看双方都不是坏人。

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更典型了，都是在同样的儒学背景里成长起来的，读一样的书，考一样的试，做一样的官，政见偏偏针锋相对。再看近代社会，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论战把西方知识界搞得沸沸扬扬，越吵就越伤和气，话里免不了夹枪带棒。但今天来看，其实谁也没有被魔鬼附体，没有成心把全世界往坑里带。

那么，面对“从道不从君”这个价值命题，国君显然会有话说：“你说你坚持真理，你坚持的就一定是真理么？我还觉得我坚持的才是真理呢。”即便退一步说，不考虑真理和谬误，仅仅在管理角度，“从道不从君”也会很让国君头痛——如果手下的大臣们人人都是这个态度，管理显然没法搞。尤其在中央集权强化之后，科层制的官僚体系开始成型，管理目标就是令行禁止，如臂使指。那么试想一下，如果国君发布一道命令，在科层制里逐级传达，最后下达基层。在这样一个传达过程里，只要有一个节点出故障，只要有一个“从道不从君”，指令就会被卡在半途，这是任何一个中央集权机构都无法容忍的事情。

那么，难道只能让儒家知识分子去做唯唯诺诺的小公务员吗？

师、友、臣

儒家有一个很巧妙的解决方案，那就是前边讲过的“师、友、臣”三分法：统治者身边的人才，既要有老师型的，需要统治者放低姿态去拜访、请教的；也要有朋友型的，彼此可以平等地探讨问题；还要有小弟型的，听指挥，能做事。

魏文侯之所以是用人的典范，就是把“师、友、臣”的组合做得十分完美。（S1-051）“师”和“友”都可以“从道不从君”，拂了国君的面子也无所谓。而在国君的角度上，向“师”和“友”征求意见并不丢脸，就算碰了一鼻子灰，挨了一顿说教，其实也不妨事，反而还会增加自己的人格光芒。而自己下达的指令自然有“臣”去完成，而不会交给“师”和“友”去办。

“师、友、臣”三分法确实是个很好的安排，但也存在着一个缺陷，那就是“师”和“友”的占比注定很小，“臣”的占比注定很大。一旦反过来，管理结构就垮了，队伍就没法带了。但问题是，对于儒家知识分子而言，当然都想为“师”为“友”，而不想为“臣”。那么，在“臣”的位置上，该怎么“从道不从君”，事情就不太好办了。

如果本国之君倒行逆施，听不进良言相劝，外国国君却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跟真理保持高度一致。那么，作为臣子，该不该弃暗投明呢？

退一步说，如果本国之君倒行逆施，听不进良言相劝，那么作为臣子，辞职总是可以的。以辞职表明自己的态度，但辞职以后，如果发现某位外国国君却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跟真理保持高度一致，还礼贤下士，三顾茅庐来请自己出山，自己该不该改弦易辙呢？

比喻成家庭关系的话，这就好比某个跟家暴男离婚的女人遇到了一个完美的追求者，该不该接受他的追求，进入美满的二婚生活呢？

司马光请王蠋为自己代言，明确表达了“不可以”。因为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”。

当这两句话被当成价值理据被抬出来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这种价值观本身就是“道”的一部分。那么，当君主和“道”背离之后，“从道不从君”是有极限的，辞职虽然义不容辞，否则就等于贪恋禄位了，为正人君子所不齿。但辞职之后，赤胆忠心可千万不能变啊。

正是在这个立身处世的大节上，司马光和王安石势同水火。

王安石的态度，可以用他自己《明妃曲》里的两句诗来作代表：“汉恩自浅胡恩深，人生乐在相知心。”意思是说，汉朝对昭君不好，但匈奴待昭君很好，昭君和匈奴人心心相知，终于过上了开心的日子，凭什么非要眷恋故国不可呢？

这样一做比较，我们会发现王安石的态度虽然挑不出多大的错，却很容易让人反感。道理很简单：人类作为群居动物，对社群纽带存在着天然认同，而这种天然的认同，其实正是司马光眼里的宇宙秩序，只不过司马光把它绝对化了而已。

我在唐诗课（《熊逸·唐诗必修50讲》、《熊逸·唐诗进阶20讲》）里曾经拿王安石的态度对比过杜甫的态度，说从王安石的反衬当中，你更能看出杜甫诗里那种对皇帝、对国家的一往情深——虽九死其犹未悔。也更容易理解，为什么杜甫的诗会在历代都被奉为诗歌在意识形态上的最高典范。

一言以蔽之，天然形成的血脉上的羁绊不是心灵可以更改的。无论你爱我或不爱我，我对你永远痴心不改。而这，正是欧阳修和司马光大声疾呼的人伦标准。

但司马光的价值观还只是强调人的一生当中，对于归属性的选择只能有一次，选择之后虽然可以退，但不能换。

这种价值观的流行，就导致了儒家所谓的“慎出处（chǔ）”，对于唯一的一次选择慎之又慎，很多人甚至谨小慎微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。所以诸葛亮在刘备“三顾茅庐”之后才终于出山，这件事为历代知识分子津津乐道；所以父母给女儿定亲也会越来越精挑细选，女儿自己也特别担惊受怕，恨不得对未来的夫婿做一番全方位的考察。以至于民间流传出“苏小妹三难新郎”的故事。

无论对于儒生还是对于女人，当一次选择足以决定终身命运的时候，耐性自然就会变得与众不同，宁缺毋滥才是明智的。但是，当我们认真考察“从道不从君”和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”这两种观念的由来之后，就会发现司马光不但有点自作多情，还不小心倒向了法家的阵地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划重点

- 1.儒家传统价值观认为“从道不从君”，真理高于国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追求真理。
- 2.站在国君角度，“从道不从君”会给管理带来麻烦，因此儒家提出了“师、友、臣”的三分法，“师”和“友”都可以“从道不从君”。
- 3.司马光在忠臣不事二君的大节上，跟王安石势同水火。这种价值观的流行，导致了儒家所谓的“慎出处”。

添加笔记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，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，和其他同学互相交流，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。课程老师@熊逸、主编@李倩也会不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~

参与讨论>

来，带你跑个中国历史马拉松

版权归得到App所有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

前一篇 后一篇

赞赏

1人已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微信 朋友圈

用户留言

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

左星星 12月1日

我觉得，一个有为的君主，是可以通过对「从道不从君」进行一定的包装，然后起到提升管理的作用，关键就在于对「道」的解释。

可以把「道」理解成明君、贤主的行为标准和道德典范，并把历史上那些好的君王的言行都记录下来，作为后世君主的行为准则和参考标准。

后来的臣子们也可以据此为谏，君王有什么做不到位的地方，臣子们就可以把「道」拿出来，建议君王改正。作为臣子，「从道不从君」，意味着他们忠于那个符合君王标准的人。

「从道不从君」是出自《荀子·子道篇》，荀子曰：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，人之大行也。

这的确很容易倒向法家阵营，儒家追寻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每个阶层各安其位，但是如果在君之上还有道，在父之前还有义，儒家理论体系就崩塌了。

3 10 129 分享